

《台灣學誌》創刊號
2010年4月 頁1-31

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的變遷及女性地位*

翁聖峰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http://singhong.blogspot.com/>

摘要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常以被殖民、被壓迫居主流，但日治時期文學尚有許多不同樣貌的文本。描繪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作品的研究，目前對這類不完全等同以往「被殖民」論述的作品尚有許多開展空間。日本殖民期間，台灣正體驗著現代化脫胎換骨的歷程，經歷「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的女性新興職業，這類職業在文學作品，成了具有時代感與「新文化」性質的文本。因官方及民間倡導廢除纏足、興辦女學、鼓勵就業，日治文學出現了相映題材的作品。目前有看護婦、女教員、交換姬、採茶女、女優、煙草女工、女車掌、織襪女工、紡織女、產婆、藝旦、一般女工等作品，本文嘗試關注女性地位的變遷，不同作家如何詮釋職業婦女，各報章媒體對職業婦女及文學有何不同描摹與評價，在日本人、台灣人間是否有差異，於新舊文學、詩、散文、小說如何描寫職業婦女。

關鍵詞：職業婦女、婦女文學、女性文學、新舊文學、日治時期

◎ 收稿日期：2009年9月14日；審查通過日期：2009年12月15日。

* 本論文為國科會98學年度(2009.08.01-2010.07.31)研究計畫「日治時期臺灣職業婦女題材文學研究」(98-2410-H-152-019-)的部份研究，2009.09.04發表時，感謝講評人楊翠教授提出寶貴意見，黃美娥教授提出建議，會後許俊雅教授提供李元貞教授的相關論文。多謝兼任研究助理葉枉樑、夏愷均協助整理文獻。謝謝江寶釵主持的「臺灣好，文學網」開放電子檢索，<http://www.literaturetaiwan.idv.tw/>。出刊前，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

一、前言：日治時期職業婦女的出現

1914年，在《台灣日日新報》上刊載了一系列的「台灣職業の女」報導，1930年，《台灣民報》有一系列的「台灣各界的職業婦女介紹」的書寫，除婦人專業雜誌《台灣婦人界》的相關討論，（作者未注明，1938：123-124；故彫刻家黃氏夫人，1937：91；鈴木讓三郎，1938：22-28）甚至1921年的《台灣警察協會雜誌》也出現〈職業婦人として女の大缺點〉的評論，（作者未注明，1921：63）顯現日治時期隨著社會的變遷，職業婦女的議題逐漸受到各界的注目。

1895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為止，茶的出口總值躍居台灣經濟作物輸出的第一名，佔百分之53%強，比糖的36.22%還多出許多。採收茶葉跟甘蔗不同，時間長達6至7個月，共需採7回，每回又分多次採收，所耗人力非常多，採茶女乃因應而生，據1905年的統計，每年需僱用20萬採茶女上山。（陳柔縉，2005：306）可見，採茶這種職業由清末延伸到日治時期，陳洛的「台北八勝」即反映日治初期這種景況，有詩作〈稻江新月〉：「揀茶人散晚煙浮，樓閣高低淡欲秋。江月澄波成畫幅，屏開雲母一銀鉤。」大稻埕傍晚揀茶人散之後柔和的夜景，另詩作〈鐵橋夕照〉：「金波激射怒潮忙，偶步橋西趁晚涼。歌罷採茶爭渡急，女郎三五喚斜陽。」（陳洛，1897）反應女子歌罷採茶共賞夕陽美景。陳惠雯稱大稻埕揀茶女超過2萬人，蕉麓的〈揀茶行〉很貼切的描寫這種盛況。¹

1895年成爲日本殖民地後的台灣，在物質上不斷接受了日本所帶來的「現代化」衝擊，女子纏足人數及比例逐年降低，²促使女子得以由家庭走出社會。解纏足運動雖非女性經濟、就業、情感自主的保證書，最初亦非女性的自主性決定，然無疑地，女性解纏足對其走向戶外發展是有直接或間接的助益。而在面對物質生活的日新月異之際，除傳統女工外，同時出現了許多新興職業，女運轉手、女車掌、女醫、女教師、看護婦、電話姬均是其例。

1914年至1930年之間，1925年的「彰化婦女共勵會」與1926年的「諸羅婦女協進會」相繼成立，雖然，這些團體的成立以民族或階級解放爲主要目的，女性解放並非位居首要的目標，但這亦顯示了台灣社會正面臨著轉型的歷史進程，婦女的解放與生活型態的改變對於傳統的台灣文化產生了衝擊。如楊千鶴的〈花開時節〉說：

¹ 蕉麓〈揀茶行〉：「稻香濃樣茶香同，萬綠叢中無數紅，道是茶熟好時節，女紅不習習茶工。兒家家住近城肆，薪桂米珠居不易，且喜茶歌入耳來，博得餘資答簪珥。準備鮮麗好衣裳，壓鬢堆花茉莉香，東鄰姊妹花兒貌，猶買胸脂鬥豔妝。釵鈿逐隊邀女伴，暮去朝來不少懶，樓簷斜月促梳頭，忙到茶行門待欸。……」詩中可見揀茶的盛況。（陳惠雯，1999：69、167）

² 1905年臨時戶口調查，纏足女性占56.9%，（楊翠，1993：56）而到了1915年「第二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當時不含五歲以下幼兒的女子數爲1353763人，其中，保持天然足者占44.23%，放足者占35.16%，纏足者占20.61%，由1905年到1915年，十年之間纏足的比例由56.9%降爲20.61%，解纏足運動可謂甚有成效。（吳文星，1992：303）。

女人的一生，從懵懂無知的初生嬰兒時期開始，又緊接著被催促要出嫁，然後在生兒育女之中，轉眼就衰老而死了。在這過程中，難道就真的可以撇開個人的感情與意志，而將自己完全託付給命運，任意受安排的嗎？（楊千鶴，1943：352）

這或許可以代表在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時代變遷下的「新」女性，已經開始了有自我，思考自己未來與想要掌握自己未來的女性自覺與意識了。³對某些具有新觀念的女性來說，走入職場謀生或許就意味著突破傳統社會觀念，以及可以將自身從傳統文化「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的思維中解放出來。日治時期的女性職業還正由於面臨社會生產方式的改變所帶來的物質變化，產生了許多新興的女性職業項目，因此日治女性若能在傳統職業與新興職業上皆能有所參與，就能呈現出多元化的婦女就業結構。

由於社會文化變遷所形成的就業環境，對於女性具有相當程度的吸引力，也由於女性自身的觀念正在改變，因此刺激了日治時期職業婦女的蓬勃發展。文學如何反映社會景況，文學與社會間有哪些互文現象，職業婦女在日治時期參與就業的情景怎樣反映在日治文學文本之中，值得探究。「職業婦女」在文學文本中，就不斷的體現出台灣的「變化」。但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新興的婦女職業究竟可以對日治的婦女地位產生多大的影響？而報章雜誌上的時尚女性、新興的婦女職業又佔了所有的日治女性人數有多少？雖然新舊的婦女職業對日治女性產生了某些層面的影響，但或許只能改變部分女性的地位，並不能夠從本質的觀念上或社會結構上做全面性的鬆動。

由底下「表一」可見 1905-1930 年度各級行業就業率，「表一」男女就業人口全部僅 100 多萬人，乃因統計時就業人口以具本業者為主，凡以副業或房地產、有價証券為生的本業人口均不列入所致。

表一 1905-1930 年度各級行業就業率

		1905		1915		1920		1930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第一級	N	763456	263664	806660	392044	807037	378629	910938	334534
	%	70.58	84.56	69.80	82.71	68.34	83.03	66.42	79.92
第二級	N	174690	37938	182308	62180	182416	53533	180760	46374
	%	16.15	12.17	15.77	13.12	15.45	11.74	13.18	11.08

³ 楊千鶴（1995：107）還在自傳《人生的三稜鏡》中提及：「提到安德烈·末洛爾，他在他的《結婚、友情、幸福》一書中如此地寫道：『突然地，結婚的問題就來了，如果是成功的話，至少在一短時間內，扼殺少女們的友情。因為兩個同樣程度的強烈的感情是無法並立的。』女人的友情真的會因為結婚就脆弱地消失嗎？」

級									
第三級	N	143521	10207	166809	19793	191389	23863	279814	37676
	%	13.27	3.27	14.43	4.17	16.21	5.23	20.40	9.00
總計	N	1081667	311809	1155777	474017	1180842	456025	1371512	418584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游鑑明，1995：29)

由「表一」可見從事農漁礦牧業等第一級行業的女性高居首位，平均有 82.56% 的女性從事這一行業，從事第二級技術性或第三級心智有關行業的女性就業人口顯著偏低。而一、二、三級職業為概略性歸納，由「表二」可見更詳細的內容。

表二 1930 年度各級行業細分類就業率⁴

行業別	職業別	本島：女	本島：男	內地：女	內地：男
一	從事農耕者	298720	843941	879	2639
	從事畜產者	28327	3813	39	106
	從事蠶業者	8	21	0	8
	從事林業者	4011	12838	57	721
	從事漁業者	930	25916	3	1617
	從事採炭者	1052	12557	0	180
	從事採礦者	222	3444	7	133
	從事石油礦業者	0	121	0	73
	從事採土石者	118	848	0	25
二	從事窯業、土石加工業者	257	4347	4	174
	從事金屬、機械、船業製造者	132	10981	12	2110
	從事精巧工業者	108	2643	1	240
	從事化學製品者	603	2026	15	394
	從事紡織工業者	5033	1774	139	441
	從事服飾製造者	9927	4427	585	556
	從事紙工業、印刷者	3518	5871	20	688
	從事皮革、骨、羽毛品製造者	9	93	0	10
從事木竹蔓類製造者	4510	20596	23	1725	

⁴ 三級行業別參考自游鑑明(1995)，《國勢調查結果表 全島編》職業大分類原分十大類，不是三大類，以「本島人」稱今台灣人，以「內地人」稱今日本人。(台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4：120-127) 本表為簡化欄目，外國人從業數未列出。

	從事製鹽工作者	205	3367	0	6
	從事飲食製造者	4772	13881	169	1532
	從事土木建築者	239	21047	1	3794
	從事瓦斯、電氣、水道業者	1	1181	0	1419
	從事其他工業者	676	3598	19	709
三	從商者	16637	120284	2067	8665
	從事金融保險業者	25	281	51	440
	從事接客業者	4962	8807	4974	1938
	從事運輸業者	911	46975	66	7283
	從事通信業者	204	1702	637	1077
	官吏、公吏及雇員	37	8655	409	16576
	陸海軍現役軍人	0	0	0	6987
	從事法務工作者	0	10	0	82
	從事教育工作者	437	3645	856	3391
	宗教家	607	3494	45	268
	從事醫療工作者	1321	3681	1277	779
	書記	65	7902	357	5247
	記者、作家、藝術家、演藝人員	643	3683	153	491
	其他自由業	65	3190	11	690
	佣人	6509	1526	1514	32
	其他從業者	6039	53545	318	2600
總計		401840	1266711	14708	75846

由「表二」39種職業別可更清楚了解三大類行業別的內容，不過，這39種職業別，是由367種小分類所歸納，如要明瞭各職業別，仍須查看367種小分類，如「表二」「從事接客業者」共20681人，看起來頗為籠統，看了小分類才知其內容分九類，有旅館負責人、料理店負責人、旅館及料理店經營者、廚師、藝妓、娼妓、旅館及料理店服務生、浴場經營、理髮及美容師。方不致將20681「從事接客業者」均簡化為風月場所的接客業者。這當中旅館業、浴場經營者，男性佔多數，但女性已有一定比例，如旅館業主937人，男性有541人，但女性也有396人；服務生則女性居多數，女性有3638人，男性僅441人；較之現在明顯不同的是「理髮師、髮結、美容師」，男性佔5910人，女性僅有401人，反映新舊時代的改變下，男女性別職業遞變的某些面向。

報章雜誌上的「新女性」，可能是藉由一種類似新聞框架（frame）的方式將少數或部分的日治女性給不斷的擴大傳播，並以紙張印刷的方式流傳下來。反

而是廣大的，更接近於庶民的一般女性在日治女性論述中「失蹤」。⁵也由於新聞框架將單一的，特別的事物給突出報導，因此加深了一般人對新興婦女職業或接客情色職業的深刻印象。Bryant & Miron 認為媒介的框架（media frames）是一種被感知出來的結構，可以對真實事件產生感知以及再現。（Bryant, J. & Miron, D., 2004）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的訊息其實是撰寫者給予我們的印象，一般大眾接收了報紙訊息並且再現了報紙上報導的內容。新興職業婦女身上所帶有的時尚感，更是一種在報紙媒體中被不斷強化的印象。導致於一般社會大眾產生一種時代正在顛覆的感覺，但實際上已經根深柢固的傳統女性地位並不那麼輕易的就被改變。由底下「表三」本島及內地女醫師共 23 人，女車掌本島及內地共 155 人，附錄所列「表四」女醫師新聞有 116 則，漢詩有 86 首，女車掌新聞有 345 則，漢詩有 83 首，女醫師、女車掌人數有限，但新聞報導及漢詩均有相當的數量。

表三 1930 年度新興職業之就業人數比較表⁶

職業別	本島：女	本島：男	內地：女	內地：男	外國人	合計
車掌	135	719	20	522	2	1398
運轉手	14	2063	1	515	4	2597
教職員	386	3020	759	3368	25	7558
藝術家	70	2017	148	238	335	2808
醫師(含牙醫)	9	1452	14	512	13	2000
產婆	794	0	237	0	1	1032
看護人	426	3	995	8	11	1443
藥劑師	51	1422	10	101	32	1616
電話接線生	196	121	586	15	1	919
金融保險業	25	281	51	440	5	802
打字、速記員	1	2	93	6	1	103
會計(含出納、簿記)	19	2052	58	900	142	3171
合計	2126	13152	2972	6625	572	25447

查索 1930 年《國勢調查結果表 全島編》藝妓 1390 人（內地 911 人、本島

⁵ 新聞報紙所追求的通常會有選擇性，一般來說會選擇較為特殊的、新鮮的，日治時期的報紙在報導日治時期的台灣女性時，也會經過可以「值得」被報導的篩選機制，這當中「男性想像」可能是重要的因素，這些新興職業提供以男性為主的撰筆者提供更多的想像空間。不過，《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民報》都曾推出過一系列的職業婦女介紹，或許是報章雜誌也意識到婦女在社會結構中的生產力，以及婦女地位或女性文化正在產生變化。

⁶ 本表參考游鑑明（1995：32）「193 年度新興職業之台男、台女、日女就業人數比較表」，並核對《國勢調查結果表 全島編》（台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4：120-127）加以修訂，如游表原寫為「教師」，依《國勢調查結果表》改為「教職員」，又本表的「藝術家」包含畫家、雕塑家、遊藝家，可能包括部份傳統畫師、雕塑、遊藝家，如原金融保險業包含「貸金業主、質屋業主」，可能包含部份傳統職業。

人 464 人、朝鮮人 2 人，外國人 13 人），娼妓 1122 人（內地 884 人、本島人 110 人、朝鮮人 127 人，外國人 1 人），人數雖較女醫及女車掌多，但佔相較於全部職業婦女的人數來說仍甚少，若再加上旅館及料理店的女性服務生，其中內地 1760 人、本島人 1693 人、朝鮮人 160 人，外國人 25 人，（台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4：120-127）相對於第一級的農業或相關加工業來說亦屬少數，在「表一」第一級產業平均約佔 82.56%。所以，從事接客情色職業的人數相對來的少，但是在日治時期的文學作品來說，此數則佔有相當的份量，相關新聞報導亦甚多，如女給的報導有 880 則，漢詩有 61 首，女優的新聞報導有 929 則，漢詩有 25 首，妓女的新聞報導有 362 則，漢詩有 54 首，其他如看護婦、產婆的新聞及漢詩亦不少。另外，娼妓、女服務生當中，朝鮮人所佔的比率不少，此點本文雖未詳論，未來值得續論其來龍去脈。

至於，從事接客情色職業的新文學創作亦不少，「附錄表二」小說楊守愚〈女丐〉、郭秋生〈死麼〉、吳希聖〈豚〉、呂赫若〈女人的命運〉、張文環〈藝姐之家〉，「附錄表三」新詩 TY〈詩的鱗片〉、陳肇基〈摩登女郎〉、瘦鶴〈可憐的少女啣珍重〉、王登山〈樓上的女人〉、黃寶桃〈故鄉〉，均是與娼優相關的創作。而女服務生反應都市的社會流動，不一定涉及情色，翁鬧的〈殘雪〉、呂赫若的〈前途手記〉、龍瑛宗的〈黑妞〉、〈白色山脈〉、〈死於南方〉作品中的人物任女服務生，新詩方面，陳固和〈走後街〉，寫漆皮的紳士鞋對酒吧的女人們，可以看到階層對比，呂赫若的〈牛車〉反應經濟困頓而出賣肉體，陳梅溪新詩〈離情〉、李張瑞〈虎頭埤〉反映女子被賣的不幸。

更接近於女性地位的或許是「夫妻制」，如以下這首漢詩所表現的男女不平等，這是新興職業也難以扭轉的女權窘境，〈新評林 上陸拒〉中提到「一夫偶一婦，權利始平均」，可見當時對於夫妻制的觀念還未達一夫一妻制，而詩人認為真正的男女平權應該要從一夫一妻制開始，因此賦詩倡志：

此後言當鑑前車非律賓。
 聚他衆美陳遙闢上陸拒。不盡異風膜。
 一夫偶一婦。權利始平均。何事多房寵。
 上陸拒。

(作者未注明，1911)

由「何事多房寵」，反映了作者對傳統一夫多妻制的醒思，權利均等須從一夫一妻制實踐起。

但不可抹煞的是，較為時尚的女性穿著與新興的婦女職業也確實改變了日治女性的視野與生活空間，並且提供了地位提昇的基礎。因此當我們在觀察「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時，更要注意到文化本身的「發展性」。文化並非是固著不定的，而是帶有發展性的有機體。傳統的文化接受新思潮新文化的衝擊時，會產生一些接受新文化的現象，然而在發展的同時也連帶的揹負著許多傳統文化。因此，「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應能同時體現傳統婦女與新時代婦女並存的景致，既有充滿現代感的「看護婦」，也有看似傳統的「產婆」。⁷因此文化的發展與社會的變遷皆是同時存有新與舊的層次，這體現於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時，就形成了此種題材文學中相當複雜的內涵。本文嘗試以社會變遷、女性地位、新舊文學以及文類等面向來探討日治時期的職業婦女。

二、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與社會變遷

日治時期日本統治台灣的策略基本上還是以「殖民」的思考為主，因此在糖業與稻業的重點發展下，開始產生了以農業為主的經濟規模。為了講究「剝削」的效率，因此以農業現代化為發展的歷史進程帶動了社會的變遷，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製糖工廠。林再復（1990：222-223）曾於《台灣開發史》中談到當時台灣有四大製糖公司：台灣、大日本、明治、鹽水，這四間製糖公司佔了所有產量的87.2%。為了運輸上的便利，因此政府又投入了相當的資源進行交通運輸的建設，這包括了基隆與高雄兩港，以及鐵路與公路的建設。日治時期女性新興職業「女車掌」的興起，即與日本進行的交通運輸建設相關。呂赫若〈牛車〉中的阿梅，在鎮上的工廠擔任女工，呂赫若〈婚約奇譚〉中的琴琴想去考護士，王詩琅〈夜雨〉的有德希望女兒秀蘭去乘合自動車會社去擔任車掌以改善家計，這皆是經由經濟與生產所帶起的女性新興職業。

前面所論的女服務生興起即是都市化新時代的產物，新休閒地點咖啡店的興起，帶動新休閒，文學作品的場景或人物也常反映之，《風月報》、《南方》許多通俗之作也常刻畫這種都市化場景，這在「表一 1905-1930 年度各級行業就業率」，所列第三級職業多數為服務業或心智相關產業的興起，第三級行業的女性1905年有10207人，1915年有19793人，1920年有23863人，1930年有37676

⁷ 不過，「產婆」一詞是由日本引進台灣，指受過西式醫學訓練且領有執照的接生人員，傳統民間未受訓的接生人員稱拾子婆、拾姐。（陳柔縉，2005：309）但有時似以「助產士」指領有執照的接生人員，「產婆」指傳統的接生人員，可能須視上下文而決定產婆是指涉哪類接生人員。

人，自 1905 到 1930，所佔的女性就業比率亦分別為 3.27%、4.18%、5.23%、9.00%，反映了日治時期台灣女性的就業變遷。

而文學作品也反映底層勞動階層，如「附錄表二」的小說，太平洋的〈夜聲〉編草帽維生、賴和〈惹事〉的寡婦為洗衣工、周定山的〈乳母〉為他人哺乳、藍紅綠〈紳士之道〉，妻為裁縫以滿足丈夫紳士夢、張文環〈闖雞〉的月里養豬維生、龍瑛宗〈不為人知的幸福〉到職員家當幫傭、學做裁縫，楊守愚〈誰害了他〉到農場做工、楊守愚的〈鴛鴦〉並反映農場做工，被監督侮辱、郭水潭〈某個男人的手記〉當中的妻到工廠工作，夫離家到歌仔戲團，黃寶桃的〈人生〉反映女工意外致死、龍瑛宗的〈黃昏月〉擬往茶廠做工償債。「附錄表三」詩歌方面，廖漢臣的〈賣花的少女〉、董佑峰的〈森林的彼方·摘花姑娘〉辛苦賣花，楊華的〈女工悲曲〉、楊守愚的〈洗衣婦〉均反映基層小人物。周添旺的〈黃昏嶺〉：「阮是十八薄命農家女／離開家鄉出外來求利，／想著歹命有時目屎滴／也是一不—得—已」，也是周添旺作品〈梅前小曲〉「小雨毛毛落味煞／冷風吹來也會寒／單身謀生來出外／親像雨中的梅花」，兩首歌詞均描寫農家女子離鄉背景工作的感傷，一方面可補貼家中的收入，另一方面卻須面對生命的飄搖。

由這些作品亦可看到謀生方式的多樣性，固然第一級農林漁牧業仍佔多數的就業人口，除了農業，文學作品的女性尚有擔任第二級行業的基層勞工或雜役。不過，新文學作品的婦女職業雖然多樣，但勞工多為基層，參照「表二」第二級行業實尚有許多不同職業，如印刷業、木竹業、飲食製造業都有相當人數，卻並未被書寫，而第一級行業，除了農耕，畜產、林業仍為數不少，卻罕看到相關書寫，張文環〈夜猿〉女主人協助先生從事竹林加工業，算是較為特別的行業書寫。

吳濁流的〈泥沼中的金鯉〉因公司見習，不用跟討厭的叔父見面、張文環〈頓悟〉的雜貨店工作、楊逵〈萌芽〉的女職員、龍瑛宗〈在街上〉的公司上班，均反映商業或都市書寫，而龍瑛宗的〈黑妞〉、青人的〈大稻埕〉或劉捷的〈大稻埕點畫〉都反映了日治時期大稻埕商業的重要場景。

日治時期新文學的發展中，一個較常見並且眾所皆知的主題是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在日治女性從事各種的職業活動中，也容易受到社會現實的剝削或是壓迫。將這點考慮在觀察日治文學的職業婦女書寫上，可以看到日治女性與社會的同步發展。1920 年 10 月 25 日《台灣日日新報》第 4 版有〈桃園短話 女工賃貴〉的報導，1923 年 12 月 28 日的《台灣日日新報》第四版有〈織布工廠 爭傭女工〉的報導，皆顯示職業婦女逐漸進入了社會結構中的生產力。楊華在〈女工悲曲〉中表現的女工書寫，也表達出飽受磨難的女工形象。謝雪紅在回憶錄《我的半生記》回憶自身曾當女工的經過：

後殿院子裏有數個大鍋，先由幾個男工把漂白粉摻在放著水的大鍋內來煮那些半加工成的粗製林投絲。煮好後，再由我們女工把林投絲用清水沖洗乾淨……。當時一般女工一天的工資只有一毛多錢。(謝雪紅，1997：50)

因社會變遷，在《台灣民報》上曾有過一系列的職業婦女報導，當中有篇〈專賣局的煙草女工〉，談到煙草女工分為日役者與巧程者，工資平均 65 錢，當時女工的薪資相對低廉的。(作者未注明，1930e) 而織襪女工最受薄待，一天 10 多時間(小時)的勞力，每日僅 3 數角而已，(作者未注明，1930a) 然而，《台灣民報》另報導新竹製造蘆草紙的女性每日可賺 4、5 角錢到 4、5 圓。「上等者，著實勝過一個台灣人的高等官。」(作者未注明，1930b) 可見，職業婦女收入亦有頗大的差異，至於，製作大甲帽女工每日可得 2、3 角至 1 元，工作可當作無聊的消遣法，或賺錢以滿足虛榮心，或為維持生計的職業，(作者未注明，1930d) 可見大甲帽手工可提供多樣的工作目的，可充實生活內容，也能增加家庭的收入，家中經濟不再僅來自男性，女性的地位在家中可能提昇，增加女性的成就感。不過，如賴和〈惹事〉的 9 歲女兒即任童工分擔家計，《台灣民報》所述的織襪女工「十一二歲的小女子、工作上比三十歲的婦人們、更加敏捷。」亦認為「由人道上看去、沒論如何、總不該給發育尚未十分的小女子、在工場做工。」在經濟困頓的環境下，反映勞工、女性、兒童權益未普遍受到重視，仍可能遭致不同形式的壓迫。

日治女性的新興職業中，由於日本統治所帶來的現代化醫療，產生了女醫、看護婦等等的女性新興職業。(游鑑明，1994；宋錦秀，2000) 而女醫的漢詩書寫中，將女醫與觀音菩薩與慈母聯想在一起：

為向深閨種杏林。如花價豈限千金。羨卿具有回春手。濟世儼同觀世音。
(茂松，1937：22)

輕言細語慰呻吟。為製良方藥徧尋。如此先生巾幗少。果然慈母一般心。
(華袞，1937：22)

懸壺事本是婆心。莫怪紅顏著意深。術擅准陀仁董奉。蒼生拜合似觀音。
(涵卿，1937：19)

救人宏願似觀音。共羨蛾眉脉理深。療得衆生無疾苦。石榴裙拜總甘心。
(文樞，1938：10)

上面詩歌將女醫與觀音菩薩、慈母聯想在一起，是由於性別上的關係，觀音菩薩帶有母性光輝的慈母形象。伴隨著新醫療方式與系統，誕生的女性新興醫療職業除了女醫之外，還有看護婦，也一樣被形容為觀音菩薩與慈母：

嬌娃左右奉晨昏。照料瘡痍不憚煩。永保人身無缺陷。功同煉石補天恩。
妙齡青眼鑒寒溫。侍奉沉疴自耐煩。身著白衣如菩薩。婆心長庇萬家門。
(楊少貞, 1936: 4)

情同慈母輒臨牀。助檢寒溫好處方。最是留神觀病勢。婆心無暇顧梳妝。
(達三, 1937: 11)

雖然日本帶來的現代化的醫療觀念，也產生了女醫、看護婦等女性新興職業。但是在日治時期也有傳統的產婆，傳統產婆與現代化的助產士、女醫之間並不衝突，因為產婆是被社會所需要的。⁸相對於女醫的形象被形容觀音菩薩與慈母，傳統的女性職業「產婆」反倒被稱形容為女醫：

收生手段本精奇。閨閣人稱似女醫。寄語婆心休草草。千鈞一髮繫安危。
(吳秉籌, 1942: 14)

坐待英雄墜地時。關心赤子讓蛾眉。奴家未曉刀圭術。每被人稱作女醫。
(洪雲林, 1942: 14)

巾幗群中最有為。婆心濟世護嬰兒。羨卿別具催生術。助產精奇似女醫。
(陳慶輝, 1942: 14)

錯被群呼作女醫。忙時脂粉不曾施。為人助產關心甚。意態殷勤技絕奇。
(吳春濤, 1942: 14)

腹痛臨盆一霎時。賴卿施術展神奇。任何難產都無恙。妙手堪誇似女醫。
(陳穎燦, 1942: 14)

在現實生活中，日治時期簡吉從事農民組合運動，簡吉被捕入獄後，其妻陳何爲了謀生，學做產婆，並且取得日本政府的執業許可，(簡吉, 2005: 18) 簡吉妻因任產婆維持家計，經濟可獨立，提供抗爭運動下婦女維生之道。從女醫、看護婦等職業的出現，可以看出社會變遷的一些徵兆，但產婆由於被社會需求而存在於現實當中。女醫、看護婦均以漢詩書寫，這兩類職業未見於新文學作品，僅在呂赫若〈婚約奇譚〉要考護士以求經濟自主，王詩琅〈夜雨〉希望女兒擔任車掌以改善家計，新舊文學對不同職業別的關心情況似有所偏重。

三、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與女性地位

⁸ 〈陸江雪梨女士口述訪談彙編〉一文提到：「在日治時代，日人對於台灣傳統的產婆也不會完全的禁止，因為仍有這個需要，而且當時培養助產士的機構也不算多。」(宋錦秀, 2000: 110)

楊翠（1993：268）在《台灣民報》裡曾找到婦女對就業現狀的不滿，或是對勞動條件惡劣的無法忍受所爆發的罷工事件，如台南台灣織布社的女工罷工、台北日華紡織株式會社罷工等等。這顯示雖然女性在就業的選擇上取得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空間，但在薪資以及就業環境等層面，仍舊受到許多不平等的對待。但若以台南台灣織布社的女工所進行的罷工行動來看，日治時期的女性也確實對於自身的權益有所發聲，這也不失為是一種女性地位的抬頭。女性地位的變化不僅從「抵抗」形態的社運行動可以看的出來，還與女性投入新興職業的活動有關。女性投入新興職業不但可能取得一定的經濟權，也象徵著走出家庭經濟的束縛，以及不完全受到父權經濟的控制。但就業本身必須參照各種情況與條件，如在賴和的小說〈惹事〉中就業的小女孩，就未必能拉抬自身的身分，也未必握有家中一定比例的經濟權：

那寡婦呢？她每日早起就有工課，料理給八歲的兒子去上學校，料理給九歲的女兒去燭仔店做工，兩個兒女出了門，她纔捧著一大桶衫褲去圳溝洗，到衫褲洗完已是將近中午，這時候她纔有工夫吃早飯，她每日只吃兩頓，儉省些起來飼豬，為飼豬是她唯一賺錢的手段，飼大豬是她最大的願望。（賴和，1932）

在這段引文中，有兩個就業的女性以及一個上學校的男性。寡婦扛起家中的經濟大任，自身辛苦異常，往往忙到快沒有時間用膳。但另一名就業中的女性為寡婦的9歲女兒，卻也投身在工作之中。兒子8歲，女兒9歲，年齡僅差1歲，只有兒子擁有上學校的權力，兩名職業婦女雖是家中經濟的來源，卻未必能改變女性的身分與地位，即使家中結構已改變為女性當家，但傳統價值觀的認同仍未改變，因此當我們在看職業婦女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時，〈惹事〉當中的母親及9歲姊姊工作以供家中8歲男子就學，這與傳統儒教社會男性要傳承家族香火應是重要的因素。

賴和〈惹事〉的寡婦堅守傳統價值觀，追求經濟改善。而楊守愚〈決裂〉朱榮與女同志為農民組合奔走，葉陶〈愛的結晶〉公學校女教員素英，與社會運動家戀愛被撤職、顯示婦女的對抗性，呂赫若〈婚約奇譚〉當中的琴琴反對傳統婚姻安排，反映了既有體制的抗衡。不同管道的產業，使得某些女性經濟得以獨立，不必依附在男性，而有的女性仍不幸被買賣，墮入風塵或是性別壓迫，失去追求幸福的主體性，顯示傳統對女性的限制，曾曉菁〈女工們要化粧〉即書寫為討監督的歡心，必須施加脂粉，這是工作對女性的壓力，賴和〈惹事〉的寡婦受警察的構陷，反映統治者的壓迫，這些作品顯示追求獨立自主的地位，可能面對不同對象的挑戰，不過，這仍然是十分可貴的，他們不必完全受外在條件所屈服，彰顯職業婦女爭取社會地位的辛勞與可貴。

而郭水潭〈某個男人的手記〉的妻子在工廠工作，夫離家到歌仔戲團，賴明弘〈結婚男人的悲哀〉先生因太太出軌而自殺、張文環〈辣菲罐子〉的畏縮男人與用語大膽的販婦阿婆，性別書寫較為特別。張文環〈土地的香味〉牛暴發戶阿鶯是個獨立經營大農園的年輕寡婦，女子經營有成是日治小說較少看到的書寫。而莊松林〈失業〉算是特例，寫妻子就業，男子失業，父代母職，衍生尷尬、趣事，與多數「失業」悲情主題不同。這些作品當中的女性透過職業，位居重要地位，擁有主動性，不再是弱者，或是被支配，顯示社會變遷的某些面向。

楊翠（1993：57）曾稱日治時期台灣女性身處「資本家——殖民者——父權」三重支配關係，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女性受教育的比例逐年提昇，走出家門就業的比例日益提高，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逐漸被打破，既有的三重支配體制結構是否依然牢不可破？游鑑明在〈日治時期台灣的職業婦女〉中對於日治時期的婦女就業環境形成的背景有一段說明：

日本殖民政府治台的五十一年間，台灣不僅在政治上有重大的改變，經濟、社會與文化也隨著產生變遷；這段時間，日本國內與中國大陸都在轉型中，這更深化了台灣各層面的變遷。其中與經濟有關的就業環境便有相當大的改變，無論就業空間，就業人口或職業項目都趨向多元，一向處在邊際地位的台灣婦女，開始進入由男性主控的就業市場。（游鑑明，1995：7）

由游鑑明的論述，可看到日治時期女性地位變化的可能性，女性透過就業或能獲取經濟獨立，打破或鬆動男性的支配關係。

許俊雅（1995：601-619）分析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女性形象，曾歸納有六類：「一、被視為男人滿足生理欲望的對象。二、無由自主被拋售賤賣的女子。三、婚姻不幸庸弱見凌的女子。四、突破禮法追求情欲的女子。五、堅貞剛毅的女子。六、其他。」許俊雅歸納的第一、二、三類當中的女性仍受環境限制，被命運所安排，第四、五種的女性突破傳統，追求命運自主，地位的提昇，顯示正反兩種不同樣貌，看到日治時期不同女性地位的限制與可能性，而職業婦女題材文學也同樣有這種現象，顯示日治時期新舊遞變階段，如許俊雅歸納的第一、二、三類的一般女性及職業婦女可能被現實環境所安排、制約，第四、五種的女性可能產生自主性，進而與不同的現實抗衡。

日治時期雖然出現如《跳舞時代》紀錄片所述的新文化、新風氣，但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傳統規訓「男女不雜坐」、「叔嫂不通問」、「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仍有相當的約束力，嘉義農校男生曾因偷看嘉義女中運動會，兩位嘉義農校男生就差點遭致退學；而新竹中學三年級鄭秋生曾因送給日本女學生一封情書而遭致停學；女醫師林翁樣，嫁給同姓的林世宗，轟

動一時。(陳柔縉, 2005: 296-305)⁹林獻堂因受傳統禮教的影響, 在德國旅遊時曾拒絕女子的主動邀舞; 吳濁流的婚姻即交由家裡安排, 結婚前吳濁流甚至未見過太太; 新舊衝擊所造成的文化失衡當然令人難以適從, 1932年黃得時曾深深感嘆:「我們怎樣生在這個過渡時代呢?」到了1939年, 吳漫沙還存在這種感受:「一個作家, 處在這新舊交替思想過渡的時代, 是有莫大困難。」(翁聖峰, 2007: 33-45) 觀看楊千鶴所寫的〈待嫁女嫁心〉、〈花開時節〉, 作品的女性面臨畢業、就業或結婚大事, 同樣面臨許多的心理矛盾與考驗。由於面臨男女關係尚處在新舊文化的過渡期, 所以, 漢詩人對女車掌另眼觀看並非特例, 這應是那時期共有的現象。

紀錄片《跳舞時代》呈現出台灣日治時期摩登的一面, 而在漢詩中也出現了不少的「跳舞女」作品。另一方面, 沈孟穎(2005: 22)的《咖啡時代——台灣咖啡館百年風騷》也點出了「女給」這個職業的存在, 我們一樣在漢詩中可以找到許多的「女給」漢詩, 跳舞女、女給、藝旦以及妓女等女性職業雖然本質上有不同的差異, 但事實上都與情慾文化或產業有所相關。以女給為例, 女給在咖啡店中陪喝的工作似乎就是從日本的藝旦文化所轉移而來。《風月報》裡有一首描寫女給〈阿霞〉的漢詩:

人生去住如萍梗。鴻爪空留處處痕。一自東墩離別後。西風冷落舊琴樽。
(作者未注明, 1935b: 4)

這首充滿感情的「女給」漢詩, 主角阿霞正是一名在咖啡店工作的女給。(作者未注明, 1935b: 4) 而在龍瑛宗作品〈燃燒的女人〉也描述過在咖啡店工作的職業女性:「情婦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女人。她原本是薔薇咖啡廳的服務生。」雖然這些女性都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風月色彩, 但女性的新興職業可以為日治職業婦女開拓新的空間是毋庸置疑的。¹⁰而女性也確實可以透過一些專屬於女性特有的職業, 去打開自身的活動與身分空間。琳達·麥道威爾在《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裡提到:

⁹ 另外, 早年賴和不但反對同姓結婚, 而且以實際行動簽署彰化街的嘆願書, 不過, 他所鄙視的是那些假孔孟之名而專做不可告人行爲的人(賴和, 1921)。早年禮拜堂, 屏風隔開, 男女分座。(陳惠雯, 1999: 156) 張文環雖有〈論語與雞〉的反傳統作品, 但他1941年為吳新榮醫院題字則取自《論語·里仁》「德不孤, 必有隣。」(陳萬益編, 2002, 正文前題字照片) 佐倉孫三稱頌台灣民風:「男女有別, 美風可欽」,(佐倉孫三, 2007: 11) 佐倉並非從負面評價台灣的傳統, 而是持正面的評價, 顯現傳統文化評價的不同面向。

¹⁰ 《咖啡時代——台灣咖啡館百年風騷》提到:「賴和有感於鬥爭時代已經過去, 投射在小說中, 這些原本投身於社會運動的有志之士, 在現實環境下屈服於統治當局, 只好藉由咖啡館的歡樂氣氛來麻醉靈魂, 忘情於貌美『女給』的溫柔鄉中。」(沈孟穎, 2005: 22) 此外, 該書還提到:「許多日治時期的小說裡, 描寫顧客與女侍之間的調笑、嘻鬧與同伴之間談笑的社交空間, 即被劃為風月雪花的不良場所。」(沈孟穎, 2005: 138)

工作並非性別中立，而是被塑造成適合男人或女人的工作，構成和維繫工作的整套社會實踐被建構出來，以便體現為社會所認可但多變的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特徵。(McDowell, Linda. 著，徐苔玲、王志宏合譯，2006：182)

「性別」在日治時期職業婦女的多元形象中，仍然具有一定的社會壓力，性別印象下的女性空間在傳統文化中仍有諸多限制，但女性在文學文本中已具有部分的空間提昇。日治時期的職業婦女在文學文本中雖然呈現較為多元與現代感的一面，如張國珍〈跳舞女〉：

廿世紀摩登女。風流燦一堂。踮蹠相握手。窈窕共偎香。樂奏隨人轉。聲喧引客狂。露胷襟弗捉。羅袖不須長。(張國珍，1936：20)

日治時期的女性，同時也面臨著諸多社會壓力與空間壓迫的問題。這些來自於社會與時代的壓力問題，大概是從三個方面所形成的，第一個是日治台灣女性與台灣男性一樣，感受到台籍與日籍的族群問題；第二個是來自傳統社會中台灣男性與女性身分地位上有階級性的問題；第三個問題則是日治台灣職業女性在從業中，可能遭遇到的職業不平等對待，這些不平等可能包括薪資與刻板印象等問題。¹¹日治職業婦女同時受到以上三種社會與時代問題的影響，這是整個大時代的問題，無論是新興職業或傳統職業都可能會遭逢。文學文本則以對婦女的描繪，來建立日治女性的主體性，這種女性主體性的形成，也許我們透過以職業婦女的文學描寫來觀看將更為清晰。張國珍〈跳舞女〉以「摩登」來形容跳舞女，黃石輝的〈女車掌〉也以「摩登」來形容女車掌，只要是日治的女性新興職業似乎就是一種「摩登」的象徵：

日夕跟隨自動車。收錢喚客興無涯。時裝本是尋常事。漫為摩登誚語加。
(黃石輝，1935：7)

除了「摩登」的形象之外，日治文學對女車掌還有一種對職業「權力」空間的描寫，這種從職業上所獲取的權力，也許正可以對以上三種來自社會與時代的壓迫，提出一些女性因職業而提昇地位的空間：¹²

長裙短髮衣開襟。輾々聲中倩影臨。昇降有權休賤視。七香車上載千金。
(曉庵，1935)

美人端的值千金。車上司權待客臨。乘降場中通一語。嬌聲宛轉動人心。
(少樓，1935)

摩托可權付小娃。給人乘票剪刀加。降昇我是初來客。指點憑卿路不差。

¹¹ 楊翠（1993：86）則以資本家、殖民者與父權來看日治女性的解放問題。

¹² 以下4首引詩的粗體底線格式為本文所加。

(姚松茂，1935)

當斯世界文明日。男女平權總不差。事業許多同負責。掌車果用到嬌娃。

(阮文仁，1935)

一券兌時一剪加。司權摩托妙年華。惜儂未具扶輪手。文運前程共嘆嗟。

(姚松茂，1935)

雖然日治時期女性可以藉由工作權來獲取地位上的提昇，但仍然存在著刻板侷限。這從女優漢詩、女給漢詩與部分的「跳舞女」漢詩等不難看出一些端倪：

珮環玉立半斜欹。婉似西施再世時。一轉秋波可憐甚。場中博得幾情痴。

(礎材，1940：10)

芳年二八破瓜時。銀幕場中演豔姿。竟是深閨何賣笑。輕腰宛轉向男兒。

(鏡塘，1940：10)

歡場接客又當筵。體態輕盈妙幹旋。羨煞西湖蘇小小。千秋史上艷名傳。

(晴雨，1936：4)

酒香花氣簇如雲。解盡腰囊已半醺。不是黃金如土賤。可憐女給惑慙慙。

(鷺村生，1935：3)

體態任風飄。如痴帶撒嬌。蛾眉誇捷足。粉黛弄纖腰。雀躍身頻動。燕飛掌輒搖。郎君真得意。攜手欲魂消。(吳金土，1931：14)

座上妙齡女。輕盈體態嬌。挺身連足蹴。舞手並頭搖。衣袖隨風轉。裙裾等雪飄。下場方送盼。惹我亦魂消。(周水柳，1931：14)

由這些較偏向於娛樂性質的女性職業來看，這些職業婦女不但在漢詩人眼中地位並沒有明顯的提昇，反而還多半帶有一些情色的色彩。不過，陳惠雯提到情色意味也相當濃厚的藝旦，則是具有一定的社會階層的：

相較於對傳統女性的束縛，藝旦已經超越了社會對於女性拋頭露面的禁忌，因為閨秀婦女的交往對象多為家人、親戚和鄰居，唯有職業名妓才有公開社交。如此看來，藝旦作為當時少數靠一己之力獲得經濟資源，及社會認可的女性階層，在開拓女性遊走的空間上，有積極的意義。(陳惠雯，1999：87)

不過，事實上也不全然如此，頑椿生描述 1932 年新竹採茶女，因主管為掌控工作的順利，限制她們收工之後的行動，致使採茶女無法自由男女交往，曾遭致半

數採茶女要辭職，後來只好解除限制，才平息風波。(頑椿生，1932) 1930年《台灣民報》稱採茶女茶園做工，熱鬧得和歌劇場一樣，她們最喜歡和挑茶葉的男人搭訕，歌詞居多鄙俚、更帶有淫蕩的氣氛。可是詩中也有文雅一點，堪作竹枝詞看的：

自從未識到此方、未知此方滿山香、阿哥可比糖蜂樣、皆因採花到此方。
 新做淺衫尺八剪、先甲襟頭後甲邊、阿妹穿針哥打結、二人有意即來連。
 阿哥心焦無人知、阿妹心焦哥念你、阿哥心焦落身肉、無人捨信給妹知。
 面前種竹葉斜斜、當今阿妹不好惹、面前講著給你好、心肝越越想別儕。
 (作者未注明，1930f)

用詞雖用客家話，有的是特殊用詞，但仍可看到男女兩性情感自由活潑的一面，與一般較嚴肅的兩性關係頗有差異，這是因採茶所衍生特有的男女情感？還是庶民間情感本有此脈絡，與一般較嚴正男女關係不同？或是歌詞內容雖活潑較無拘限，而現時生活當中男女情感仍有頗多限制，顯示民間文學當中歌謠表現與現實生活的落差，¹³也讓早期男女之防較嚴格的時代，透過採茶歌謠打開一扇自由的窗口。

四、職業婦女題材文學的虛實

1930年年初，《台灣民報》進行台灣各界的職業婦女介紹，計有看護婦、交換姬、採茶女、女給、蓮草紙女工、編帽女工、女車掌、產婆、女教員、織襪女工等職業，此系列介紹前尚有序言：

台灣人的經濟力日漸衰□(字跡不清)、一方面男子們多在失業中作生活難的呻吟、又一方面在纖弱的女子們、亦不得不感著同樣的困苦了。婦人之就業、雖是婦人的生活和自覺程度的進步、但由另一方面觀察、是勢不得已而被迫入於生存競爭的戰場裡的了。她們女子的職業勞働、除些得資本主義的特典、而能自主的醫師與產婆外、何嘗不是一切的自由被奪一空？何嘗不是把一切高潔的快樂和幸福犧牲了嗎？(作者未注明，1930c)

由於 1929 年末發生世界性經濟大恐慌，¹⁴日本及台灣也受到波及，此段序言反映當時台灣經濟的困頓，職業婦女就業固然是時代的進步，同樣須受資本主義的

¹³ 民間文學的某種特質，在李獻璋編選(1936)的《台灣民間文學集》中，無論發聲者是家庭婦女或是娼妓，或其他不同身份的女性，都同樣具有情感活潑流動，表達直接的特質；至於，這些民間文學特質的產生與表現，與各個不同職業的關係程度，未來仍值得續行探究。

¹⁴ 1929年10月24日紐約華爾街證券交易所的股價大跌，10月29日美國經濟完全崩潰。1932年的英國，全職勞工每4人就有1人失業，失業人口高達275萬。德國經濟陷入谷底，1932年有558萬人、大約4成的民眾失業。1930年，日本有300萬名勞工失業，1929年至1931年的出口甚至減少一半，1932年又恢復1929年的水準，克服了經濟不景氣。(宮崎正勝，2008:220-228)

剝削，惟獨自由業的醫師與產婆能幸免於勞動約制。有趣的是，此系列職業婦女專題報導有包括產婆，卻無女醫，這是因為女醫人數較少，在社會上並不普遍所致？或是《台灣民報》較關心的是中低階層的職業婦女，故所列的序言雖彰顯女醫的地位，卻無專文介紹。

這種報導情形在台灣新文學並非特例，不論是小說或新詩罕見以女醫為題材的作品，商業或新興職業題材的作品亦相當有限，社會底層是更為關心的對象，這與當時創作的反映普羅大眾的苦難，並藉作品喚起社會的關心，對商業或新興職業題材罕見處理，原因可能在此，如女車掌是婦女的新興職業，可發現 83 首漢詩，《台灣民報》卻僅有 1929 年翻譯自日文的〈女車掌的日記〉，（翁聖峰，2009：207-246）除此，罕見女車掌題材的新文學作品。

戴寶村稱日治時期日本本土的國民年所得為美金 190 元，位居亞洲第 1 名，台灣國民年所得美金 120 元，位居亞洲第 2 名。（莊金國，2007）然對照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作品似乎不易看到這種以高收入為主要的書寫對象，受到民族、階級剝削可能是主因，而創作者較多著墨低層社會可能亦是重要原因，如日治時代，佃農始終高佔全農家戶數的 40% 左右，自耕農、半自耕農各佔 30%，即農戶背景有 70% 是自耕農、半自耕農與佃農，（周憲文編，1980：460-462）佃農面對「鐵租」，無論災害歉收，佃農必須照常繳納。創作者對農村的描寫多數集中在這個社會底層，甚至是連押地金都付不出的對象。

當然，日治時期新文學作品也有許多以富戶吸食阿片為背景的作品，這些作品幾乎都是被批判的對象，與描寫底層人物適成對照，職業婦女題材文學在這種書寫氛圍之下，也頗多反映宿命色彩或社會諸多的不公義現象。相對地，新文學作品較罕書寫新興的職業婦女，「表四」在漢詩裡反而可以看到女醫、女車掌、看護婦、產婆等作品，舊文人反映社會底層對象的迫切感較低，所以，對不同階層的新興職業婦女反而有所著墨。

在殖民統治之下，對社會的貧富不均可能藉由文學投射出來，在新文學作品裡對殖民地、權勢者強取豪奪多所刻畫，在現實之中不必然如此，如蔡阿信曾為童養媳，不向命運低頭，母親透過訴訟，爭得了繼父遺產管理權，供蔡阿信升學、留學日本，為醫生，後來還當選日治時期《台灣民報》所辦的模擬選舉的民意代表。（楊翠，1993：499）1935 年吳姓女車掌即透過法律的告訴而維持其聲譽，這則司法糾紛由來自內地的猿渡司法主任主持，識破某甲的詭辯，最終某甲須登報道歉，吳姓女車掌藉由司法告訴討回了公道，發揮了「法」的精神，這一方面固然顯現社會的複雜性，也看到新時代問題解決方式的轉變，藉由國家公權力的伸張而獲得保障，殖民統治者對女車掌並非都只居剝削角色。（作者未注明，1935a）這種女性或職業婦女的現實境遇，較之諸多男性作家對社會弱勢者的文學書寫有所不同，作家可能藉由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社會黑暗面，希望引起社會大

眾對弱勢者的關心，然而，這種社會黑暗面是現實生活的部份面相，而非全貌；明瞭此點，才能理解日治時期社會的多元相向，除了諸多帶有悲情色彩的文學作品，同時亦存在如「跳舞時代」的新興都會風貌。

文學與社會某種程度斷裂的書寫，在童養媳也可看到，日治時期新文學作品當中的童養媳多為「苦情」形象，然而，對比游鑑明論南崁《媳婦仔研究》，顯示親生子女與童養媳的待遇可能有所差別，與養父母關係頗多還不錯。（游鑑明，2009：87-91）1912至1917年大稻埕女子公學校139人學生資料當中媳婦仔即有31人，（陳惠雯，1999：171-176）佔22%，與文學當中媳婦仔的灰姑娘書寫頗有差異。

關於日治時期台灣小說許俊雅曾有評論：

由於作者現實生活、文學素養的局限，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的題材顯得不夠豐富，作品的視野似亦不夠寬廣，因而有時在同類題材的作品中，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或者由於篇題命名雷同，遂不免滋生糾結纏繞，難以釐清之困惑。……就整個新文學的萌芽、發展到台灣光復，為時不過二十年光景，自難以今日之標準來求全責備。（許俊雅，1995：653、657）

許俊雅的研究揭櫫日治時期台灣小說某些不足之處，賴明弘對三〇年代台灣文壇曾寫出感想：「像每日的文藝欄裡登出很多的布爾文藝。什麼曙光哪。隨筆哪。短篇小說哪……等々莫不現出布爾文學的遺骸。御用文學的殘滓。」（明弘，1932）周定山針對過去小說界三大潮流，提出分析：揭穿有閑階級的假面具，屬階級的文學，少有深刻動人的作品。專刻劃青年男女的苦悶，婚姻制度的缺陷的，屬戀愛的文學，多是很無聊的對比式的一對熱烘烘在哥々妹々，一對在咒罵著父母主婚的專制，和古代的才子佳人式的虛偽，有什麼差異呢？專暴露貪官污吏的黑幕，屬政治的文學，這一類就得算差強人意了！（周定山，1934）探討日治時期台灣職業婦女題材文學放在整個文學發展的脈絡去看，文學的虛實與現實的虛實，可能反映部分相關，但作家亦可能透過擴大、扭曲、改寫等手法，試圖藉由文學而反映現實政治的良窳，明瞭這些作品創作的可能因素及其得失，可能有更宏觀的思考。

至於，黃美娥探討李逸濤通俗小說，發現其女性角色著重在女俠、女英雄書寫，（黃美娥，2004：243-276）反映娛樂、浪漫特性，固然，與殖民社會問題的強烈關懷有所不同，反映日治早期的女性想像。

當我們面對大歷史可能嘗試建構整個時代的面貌，而生活史並提供不同的職業婦女的樣貌。面對斷裂的歷史與散佚的文獻，在歷史、文學不同的領域，對職業婦女的書寫展現哪些異同點，十分值得反思。顧燕翎論婦女運動與政治、社會運動曾指出：

婦女運動若略有成效必然遭致來自各方的反撲或收編。婦運和女性主義遭逢的困阻有許多方面，來自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的觀點與經驗，對早期的女性主義論述固然發揮了補強的作用，卻也予反女性主義者口實，用階級、民族、種族的差異來消滅或模糊性別認同，企圖將婦運收編入男性主導的政治、社會運動。（顧燕翎等，1999：X）

探討「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不論在新舊文學，不同的文類、作家之間，「職業婦女題材文學」是否站在婦女的立場，或僅居整個社會、政治運動一環，甚至被男性「收編」？女性運動是否被工具化？女性文學是否被工具化？日治時期台灣與第三世界的發展有哪些異同，這些問題均值得持續推敲？

五、結語

不論是新文學或舊文學的職業婦女題材文學的作品多數是出自男性之手，除了熟知的楊千鶴、葉陶的作品外，創作者許多是出自男性，而標示為賴雪紅、張碧華、黃寶桃之名雖為女性名稱，但仍可能不脫是出自男性之筆。¹⁵這些作品多是從男性角度來書寫職業婦女，在女性作家甚為有限的時代，要求多數以女性作家的職業婦女書寫來探討此主題，亦甚為困難，但我們論述時，須將出自女性之手的女性文學與多數出自男性之筆的女性題材文學做適度的區隔，方不致將創作對象混淆了。

日本殖民期間，台灣正體驗著現代化脫胎換骨的歷程，經歷「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的女性新興職業，這類職業在文學作品，成了具有時代感與「新文化」性質的文本。各個時代因生命感的不同，我們都不斷在重寫或改寫歷史，不過，即使是在 2001 年，邱貴芬尚稱：「我將從台灣女性文學史編撰的一頁空白說起」，（邱貴芬編，2001：3）若由台灣女性文學的「空白說」來看，這不是女性文學史的重寫或改寫，而是從無到有的開創新頁。固然，日治時期婦女題材文學的研究如丁鳳珍（1996）、呂明純（2007）、吳品賢（2001）已有相當成績，不過，仍有許多面向值得開拓及深化。

¹⁵ 楊千鶴女士在〈殷切期待更慎重的研究態度〉一文中則說：「我記得賴氏雪紅是我所認識的一位日本男士的筆名。」「依我瞭解當時的情形，可以說並不是真正有一位名為賴雪紅的台灣女作家存在。（此外，在《民俗台灣》上，也有另一位我認識的日本男性以李氏杏花為筆名。）總之，當時有些男性曾以台灣女性的名字寫作。」若依楊千鶴女士的說法，則連黃氏寶桃與張氏碧華的女性作家身份都受到質疑。（丁鳳珍，1996：緒論）又羊子喬（1982：199）詩人簡介，稱黃寶桃：「基隆人，是一位男性詩人。」2009 年 8 月 29 日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經研究者詢問羊子喬先生關於詩人簡介的出處，羊子喬稱是得自黃得時、林芳年的說法。《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未完全注意女性作者姓名與實況的落差，直接將黃寶桃、賴雪紅作品視為女性之作，值得再加商榷。（呂明純，2007：305-312）而李元貞由陳梅溪、吳濁流、郭水潭對黃寶桃的稱謂，認為黃寶桃是女作家，（李元貞，2005：261）然而陳梅溪、吳濁流、郭水潭是認識黃寶桃本人？還是僅由作者的姓名推論其為「女士」、「女性作家」？關於此點似乎仍須再加考證。

報章雜誌上的「新女性」，可能是藉由一種類似新聞框架（frame）的方式將少數或部分的日治女性給不斷的擴大傳播，並以紙張印刷的方式流傳下來。也由於新聞框架將單一的，特別的事物給突出報導，因此加深了一般人對新興婦女職業或接客情色職業的深刻印象。反而是廣大的，更接近於庶民的一般女性在日治女性論述中「失蹤」。新聞報紙所追求的通常會有選擇性，一般會選擇較特殊的、新鮮的，日治時期的報紙在報導日治時期的台灣女性時，也會經過可以「值得」被報導的篩選機制。因此在篩選過後登上版面的，可能會是比較特殊的，可稱為新聞者，例如說登上報紙的女車掌形象，都與意外這種具新聞性的新聞為大宗。但由於刊物的不同，在《風月報》上的女性形象就會偏向風月或娛樂場所的女性，尤其在照片或圖片方面更是如此。但一般普通的女性大眾生活，較接近庶民的女性生活，由於不具新聞性或被報導性，而較不易在報章雜誌上看到。

女性投入新興職業不但可能取得一定的經濟權，也象徵著走出家庭經濟的束縛，以及不完全受到父權經濟的控制。不過，新興職業婦女身上所帶有的時尚感，更是一種在報紙媒體中被不斷強化的印象。導致於一般社會大眾產生一種時代正在顛覆的感覺，但實際上已經根深柢固的傳統女性地位並不那麼輕易的就被改變。許俊雅分析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女性形象，曾歸納有六類，許俊雅歸納的第一、二、三類當中的女性仍受環境限制，被命運所安排，第四、五種的女性突破傳統，追求命運自主，地位的提昇，顯示正反兩種不同樣貌，看到日治時期不同女性地位的限制與可能性，顯示日治時期社會的新舊遞變。

戴寶村稱日治時期日本本土的國民年所得為美金 190 元，位居亞洲第 1 名，台灣國民年所得美金 120 元，位居亞洲第 2 名。然對照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作品似乎不易看到這種以高收入為主要的書寫對象，受到民族、階級剝削可能是主因，而創作者較多著眼於下層社會亦是重要原因。新文學作家可能為了反映時代某些弊病，進而放大書寫社會的黑暗面，而傳統文人較無時代使命的負擔，在新興職業婦女題材的書寫反而更為多元，「附錄表一」在漢詩裡反而可以看到女醫、女車掌、看護婦、產婆等作品。就文類的書寫而言，新文學的職業婦女書寫以小說為主，新詩為輔，而傳統文學則以古典詩為大宗，顯現新舊文學的表述方式亦有所差異。

引用書目

- 丁鳳珍，1996，〈台灣日據時期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緒論〉，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http://ws.tw1.ncku.edu.tw/hak-chia/t/teng-hong-tin/sek-su/sulun.txt>。
- 少樓，1935，〈女車掌〉，《詩報》，第 110 期，頁 8，1935.08.01。
- 文樞，1938，〈女醫〉，《詩報》，第 188 期，頁 10，1938.11.03。
- 羊子喬編，1982，《森林的彼方》，台北：遠景。
- 佐倉孫三（林美容編），2007，《白話圖說台風雜記——台日風俗一百年》，台北：國立編譯館編、台灣書房印。
- 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
- 吳金土，1931，〈跳舞女〉，《詩報》，第 14 期，1931.06.15。
- 吳秉籌，1942，〈產婆〉，《詩報》，第 272 期，頁 14，1942.05.20。
- 吳品賢，2001，〈日治時期台灣女性古典詩作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春濤，1942，〈產婆〉，《詩報》，第 272 期，頁 14，1942.05.20。
- 呂明純，2007，《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宋錦秀編著（宋錦秀、劉安怡紀錄），2000，《日治台中婦女的生活》，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 李元貞，2005，〈日本殖民時代一位台灣女作家的「自殺」疑案——洞悉性別與階級、國族交織的悲劇〉，收錄於《走出殖民陰影論文集——2004 亞太文學論壇》，高雄：台灣筆會，頁 257-263。
- 李獻璋，1936，《台灣文間文學集》，台北：台灣文藝協會。
- 沈孟穎，2005，《咖啡時代——台灣咖啡館百年風騷》，台北：遠足文化。
- 阮文仁，1935，〈女車掌〉，《台南新報》，1935.08.23，第 8 版。（第 12081 號）
- 作者未注明，1911，〈新評林 上陸拒〉，《台灣日日新報》，1911.08.25，第 1 版。
- 作者未注明，1930a，〈台灣各界的職業婦人介紹（八） 織襪女工最受薄待 勞力多收入少 工場沒有衛生〉，《台灣民報》，1930.02.22，第 7 版。
- 作者未注明，1930b，〈台灣各界的職業婦人介紹（四） 製造蓮草紙的女性 工作三更猶未息 深閨好作讀書郎〉，《台灣民報》，1930.01.25，第 8 版。
- 作者未注明，1930c，〈台灣各界的職業婦人介紹〉，《台灣民報》，1930.01.01，第 12 版。
- 作者未注明，1930d，〈家庭副業 帽子編女工的心事 或當作無聊的消遣法 或賺錢以滿足虛榮心 或為維持生計的職業〉，《台灣民報》，1930.01.11，第 5 版。
- 作者未注明，1930e，〈專賣局的煙草女工〉，《台灣民報》，1930.02.15，第 7 版。
- 作者未注明，1930f，〈採茶女 她們做工的茶園 熱鬧的和歌劇場一樣 採茶戲由此發源〉，《台灣民報》，1930.01.01，第 12 版。
- 作者未注明，1935a，〈謝罪息事 維護名譽〉，《台灣日日新報》，1935.06.27，第 4 版。
- 作者未注明，1935b，〈阿霞〉，《風月報》，第 14 期，頁 4，1935.06.29。
- 作者未注明，1938，〈職業婦人十戒〉，《台灣婦人界》，第 5 卷第 1 號，頁 123-124。

- 周水柳，1931，〈跳舞女〉，《詩報》，第 14 期，頁 14，1931.06.15。
- 周定山，1934，〈還是烏煙瘴氣蒙蔽 文壇當待此後〉，《先發部隊》，第 1 號，1934.07.15。
- 周憲文編，1980，《台灣經濟史》，台北：台灣開明。
- 明弘，1932，〈對最近文壇上的感想（一）〉，《新高新報》，1932.08.26，第 9 版。
- 林再復，1990，《台灣開發史》，台北：三民。
- 花道人，1931，〈職業女四詠——女車掌〉，《三六九小報》，1931.07.07，第 4 版。
- 邱貴芬編，2001，《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台北：女書文化。
- 姚松茂，1935a，〈女車掌〉，《台南新報》，1935.08.23，第 8 版。（第 12081 號）
- 姚松茂，1935b，〈女車掌〉，《台南新報》，1935.08.25，第 8 版。（第 12081 號）
- 洪雲林，1942，〈產婆〉，《詩報》，第 272 期，頁 14，1942.05.20。
- 茂松，1937，〈女醫〉，《風月報》，第 47 期，頁 22，1937.09.02。
- 宮崎正勝著（黃秋鳳譯），2008，《圖解世界近現代史》，台北：英屬蓋曼群島裔家庭傳媒城邦。
- 翁聖峰，2007，《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國立編譯館編、五南圖書印。
- 翁聖峰，2009，〈日治時期台灣「女車掌」文學與文化書寫〉，《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頁 207-246。
- 張國珍，1936，〈跳舞女〉，《詩報》，第 129 期，頁 20，1936.05.15。
- 涵卿，1937，〈女醫〉，《風月報》，第 48 期，頁 19，1937.09.21。
- 莊金國，2007，〈扎根知日教育認識台灣日治歷史〉，《新台灣新聞週刊》，第 586 期，2007.06.14。
- 許俊雅，1995，《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
- 陳柔縉，2005，《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台北：麥田。
- 陳洛，1897，〈台北八勝〉，《台灣新報》，1897.11.05，文苑欄。（第 363 號）
- 陳惠雯，1999，《大稻埕查某人地圖——大稻埕婦女的活動空間／近百年來的變遷》，台北：博揚。
- 陳萬益編，2002，《張文環全集·小說集（五）》，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 陳慶輝，1942，〈產婆〉，《詩報》，第 272 期，頁 14，1942.05.20。
- 陳頌燦，1942，〈產婆〉，《詩報》，第 272 期，頁 14，1942.05.20。
- 晴雨，1936，〈節子〉，《風月報》，第 44 期，頁 4，1936.02.08。
- 游鑑明，1995，〈日治時期台灣的職業婦女〉，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游鑑明，2009，《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台北：五南。
- 游鑑明訪問（吳美慧等紀錄），1994，《走過兩個時代的女性——職業婦女訪問紀錄》，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 華袞，1937，〈女醫〉，《風月報》，第 47 期，頁 22，1937.09.02。
- 黃石輝，1935，〈女車掌〉，《詩報》，第 114 號，頁 7，1935.10.01。
- 黃美娥，2004，《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
- 楊千鶴（林智美譯），1943，〈花開時節〉，《台灣文學》，第 2 卷第 3 號。（收錄於向陽編，2006，《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小說卷·日治時期》，台北：聯合文學。）
- 楊千鶴，1995，《人生的三稜鏡》，台北：前衛。

- 楊少貞，1936，〈看護婦〉，《詩報》，第 132 期，頁 4，1936.07.01。
- 楊翠，1993，《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台北：時報。
- 達三，1937，〈看護婦〉，《詩報》，第 155 期，頁 11，1937.06.25。
- 頑椿生，1932，〈竹塹漫談 採茶女〉，《台灣新民報》，1932.05.17，第 8 版。
- 曉庵，1935，〈女車掌〉，《詩報》，第 110 號，第 8 版，1935.08.01。
- 賴和，1921，〈來稿訂誤取消〉，《台灣日日新報》，1921.11.10，第 6 版。
- 賴和，1932，〈惹事〉，《南音》，第 1 卷第 2 號、第 6 號、第 9 號、第 10 號合刊號，1932.01.17、1932.04.02、1932.07.25。
-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1997，《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
- 礎材，1940，〈女優〉，《詩報》，第 222 期，1940.04.20。
- 簡吉著（簡敬等譯），2005，《簡吉獄中日記》，台北：中研院台史所。
- 鏡塘，1940，〈女優〉，《詩報》，第 222 期，頁 10，1940.04.20。
- 顧燕翎等編，1999，《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台北：女書文化。
- 鷺村生，1935，〈台北竹枝詞〉，《風月報》，第 10 期，頁 3，1935.06.13。
- 台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4，《國勢調查結果表 全島編》，出版者未注明。
- 作者未注明，1921，〈職業婦人として女の大缺點〉，《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44 期，頁 63。
- 故彫刻家黃氏夫人，1937，〈よい仕事を〉，《台灣婦人界》，第 4 卷第 4 號，頁 91。
- 鈴木讓三郎，1938，〈職業婦人と結婚問題〉，《台灣婦人界》，第 5 卷第 4 號，頁 22-28。
- Bryant, J. & Miron, D. (2004, December).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4), pp.589-615。
- McDowell, Linda. (琳達·麥道威爾) 著，徐苔玲、王志宏合譯，2006，《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台北：群學。

附錄

附錄表一 日治時期「漢詩」與《台灣日日新報》中的職業婦女彙整表¹⁶

一、風月與演藝類			
序	職業別	相關「漢詩」數量	《台灣日日新報》相關新聞數量
1	跳舞女	54	15
2	女給	61	880
3	藝旦	0	9
4	女優	25	929
5	妓女	54	362
第一類合計		194	2195
二、學校類			
序	職業別	相關「漢詩」數量	《台灣日日新報》相關新聞數量
6	女教員	0	351
7	女學生	3	921
8	女教師	1	108
第二類合計		4	1380
三、傳統產業類			
序	職業別	相關「漢詩」數量	《台灣日日新報》相關新聞數量
9	採茶女	51	9
10	茶肆女	2	0
11	農婦	22	15
12	紡織女	0	3
第三類合計		75	27
四、醫護類			
序	職業別	相關「漢詩」數量	《台灣日日新報》相關新聞數量
13	護婦	20	1482
14	看護婦		1447
15	產婆	49	612
16	女醫	86	116
17	助產婦	0	262
第四類合計		155	3919

¹⁶ 本表《台灣日日新報》相關新聞、漢詩檢索均採用大鐸資訊版 (<http://ttsgroup.com.tw/newpage1/homepage.htm>)，與漢珍數位圖書版 (<http://www.tbmc.com.tw/tbmc2/cdb/intro/Taiwan-Jnewspaper.htm>) 因檢索方式不同，數量可能不一致。

五、新興職業與其它職業類			
序	職業別	相關「漢詩」數量	《台灣日日新報》相關新聞數量
18	交換姬	16	7
19	女作業員	0	0
20	女工	5	498
21	女兵	0	25
22	女傭	0	35
23	女販	0	3
24	女車掌 ¹⁷	83	345
第五類合計		104	910
以上五類總計		531	8431

附錄表二 日治時期「小說」中的職業婦女

作者	篇名	出處	創作時間	大要
楊守愚	女丐	台灣新民報 346、347 號	1931.01.10、01.17 (1928.11.28 稿)	父賭徒，明珠落風塵，染梅毒。
太平洋	夜聲	台灣新報 249 號	1929.02.24	編草帽維生，因戶稅，保甲稅等重擔，無法提共孩子遠足交通費一角，致遠足未能成行。
郭秋生	死麼	台灣民報 279-283 號	1929.09.22、 09.29、10.6、 10.13、10.20	女子落煙花，多次被轉賣，不斷改名。
楊守愚	誰害了他	台灣民報 204、205 號	1930.03.15、03.22	妻子農場做工，因「操榮過度，營養不良」而死。
莊松林	失業	台灣新文學 2 卷 5 號	1937.06.15 (1932 舊作，1937.03.09 改)	妻就業，男失業，父代母職，尷尬、趣事，希望岳母來協助家務。
賴和	惹事	南音 1 卷 2、 6、9、10 號	1932.01、04、07	寡婦為洗衣工，九歲女兒去炮燭工場，八歲兒子就學。
楊守愚	決裂	台灣新民報	1933.01.01、	妻湘雲維持家計，朱榮

¹⁷ 翁聖峰 (2009) 已整理 82 首日治時期女車掌古典詩，今再於《三六九小報》1931 年 7 月 7 日 4 版發現署名「花道人」的〈職業女四詠：女車掌〉：「洋裝々得好身材。手把車單叫賣來。放眼道旁頻顧盼。探身窗外事招徠。口中土篤能兜客。胸際荷包便貯財。只恐顧麻運轉手。喚停喚歇費疑猜。」

		396-399 號	01.09、01.16、 01.23	與女同志為農民組合奔走，妻吃醋。
周定山	乳母	台灣新文學 1 卷 3 號	1936.04	為賺錢，為他人孩子哺乳，致己兒病死。
吳希聖	豚	福爾摩沙 3 期	1934.06	阿秀為家計，落風塵，將性病傳給保正伯復仇等。
楊守愚	鴛鴦	台灣新文學 1 卷 10 號	1936.12 (1934.12.16 稿)	鴛鴦農場做工，被監督侮辱，丈夫殘障，未能體諒。
郭水潭	某個男人的手記	大阪每日新聞	1935	妻工廠工作，夫離家到歌仔戲團。
呂赫若	牛車	文學評論 2 卷 1 號	1935.01	楊添丁牛車受時代淘汰，謀生不易，為維持家計，阿梅在鎮上的工廠工作，後來甚至犧牲肉體。
葉陶	愛的結晶	台灣新文學附 屬新文學月報 1 號	1935.01.15， 1936.02 刊	素英原公學校女教員，薪水須奉養父母，延誤婚期，與社會運動家戀愛被撤職。
呂赫若	婚約奇譚	台灣文藝 2 卷 7 號	1935.07	社會主義琴琴逃婚，想去考護士。
翁鬧	殘雪	台灣文藝 2 卷 8、9 號合刊	1935.08	玉枝喫茶店賺錢，匯票 50 圓給東京愛人，被拿一半金額。
黃寶桃	人生	台灣新文學 創刊號	1935.12	金英為減輕丈夫負擔，擔任女工，卻因身孕，反應不及，橫遭意外致死
呂赫若	前途手記	台灣新文學 1 卷 4 號	1936.05	淑眉在在咖啡廳當女侍。
藍紅綠	紳士之道	台灣新文學 1 卷 5 號	1936.06	妻為裁縫，滿足丈夫的紳士夢
吳濁流	泥沼中的金鯉	台灣新文學 1 卷 5 號	1936.06	得到了差事的她，住在她學生時代住慣的公寓裏。在公司裏最初是見習，而且也不用跟討厭

				的叔父見面。
呂赫若	女人的命運	台灣文藝 3 卷 7、8 號合刊	1936.08	雙美想獨占瑞奇，辭去藝旦，從事舞女工作，後被拋棄，欲任妓女報復。
賴明弘	結婚男人的悲哀	台灣新文學 2 卷 2 號	1937.01	下女 17 歲，面臨解職。先生因太太出軌而自殺。
龍瑛宗	黑妞	海を越えて 2 卷 2 期	1939.02	那是本島人鎮的大稻埕的一個角落，有一家怪異的喫茶店前，有三個十四五歲的女服務生，正在等待客人的光顧。
龍瑛宗	黃昏月	文藝首都 8 卷 7 期	1940.07	彭英坤死後留下債務，妻擬茶廠做工，維持家計。
張文環	辣菲罐子	台灣藝術 2 號	1940.04	畏縮男人與販婦阿婆間的內心衝突
張文環	藝姐之家	台灣文學 創刊號	1941.05	采雲原從事選茶工作，後淪為藝旦，有自殺解脫的念頭。
張文環	頓悟	台灣文學 2 卷 2 號	1942.03	阿蘭卻在我服務的的商店隔壁的一家雜貨店工作。
張文環	闖雞	台灣文學 2 卷 3 號	1942.06	家道中落，月里被邀請當遊行的弄車鼓的「車鼓旦」，竟一口答應了。養豬維生，後殉情。
楊千鶴	花開時節	台灣文學 2 卷 3 號	1942.07	女人的一生，不就是從嬰兒期，經過懵懂的幼年期，然後就是一個接一個學校地讀個沒完（女學生）。
龍瑛宗	白色山脈	台灣時報 24 卷 9 期 (273 號)	1942.09	這個旅舍的女服務生一共有四個人，每一個人都好像經歷過塵世的辛酸，肌膚粗糙，對生活疲倦了的神情。

龍瑛宗	死於南方	台灣時報 24卷9期 (273號)	1942.09	助役請我一起去大稻埕的咖啡店，女服務生很漂亮、館內豪華，使我這個鄉下人大吃一驚。輪值的女服務員叫愛子。
龍瑛宗	不為人知的幸福	文藝台灣 4卷6期	1942.09	然後，我便經過人家的介紹，到台北住進了高級會社的職員家當幫傭。
龍瑛宗	某個女人的記錄	台灣鐵道 364號	1942.10	女人做洗衣女幫助家庭經濟。負責洗四個家庭的衣服，一個月大約得到十圓的收入。
賴雪紅	夏日抄	台灣文學 2卷4號	1942.10	阿母回來以前，去製糖會社。
楊達	萌芽	台灣藝術 3卷11號	1942.11	我想起我的同學 R 和 K 在公司裡當女職員。
龍瑛宗	在街上	台灣鐵道 10月號	1943.10	女人是五年前在公司裡的同事。大約並排著桌子工作了一個月以外。不過，現在這樣子被發現而交談起來。
張文環	土地的香味	台灣文藝 1卷3號	1944.07	服務的女生是鄉下出身的。牛暴發戶阿鶯是個獨立經營大農園的年輕寡婦。

附錄表三 日治時期「新詩」中的職業婦女

作者	篇名	出處	時間	大要
陳固和	走後街	台南新報	1932	漆皮的紳士鞋對酒吧的女人們
楊華	女工悲曲	台灣文藝 2卷7號	1935.07.01 (作於 1932.01.15)	誤認清晨，未吃早餐去工餐，忍受饑寒
楊守愚	洗衣婦	台灣新民報 405號	1932.03.05	三歲小孩臥病床上，為著生之執著，餓！卻教她無法迴避。

陳梅溪	離情	台灣文藝 創刊號	1934.11	村姑為孝順爹娘，被賣到城裡，連心上人都放棄了
廖漢臣	賣花的少女	台灣文藝 2卷7號	1935.07.01	忍受無情歧視，為了維生仍須賣花
李張瑞	虎頭埤	台灣新聞	1935	十三歲被賣女孩被遊客逼來泛舟
TY	詩的鱗片	台灣文藝 2卷3號	1935.03	弟兄被迫做小偷，姊妹被迫賣皮肉
董佑峰	森林的彼方·摘花姑娘	台灣文藝 2卷5號	1935.05	詩劇，摘花姑娘約十八歲
陳肇基	摩登女郎	台灣新民報 文藝欄	1935.08	為經濟背景，落入皮肉生涯
曾曉菁	女工們要化粧	台灣新聞 文藝欄	1935.08	女工早晨六點下農場工作，為討監督歡心，施脂粉
瘦鶴	可憐的少女 啣珍重	台灣新文學 創刊號	1935.12	希望落入風塵酒女的早日脫離苦海
王登山	樓上的女人	台灣新聞	1936	青樓女人欲求新感情、生活
青人	大稻埕	台灣新文學 1卷4號	1936.05	聖淨少女把蒼白的臉擦紅，年輕人隨著琴音而啜泣
黃寶桃	故鄉	台灣文藝 3卷7、8號	1936.08	為經濟而離鄉背景，淪落風塵

附錄表四 日治時期「歌謠」中的職業婦女

序	作者	篇名	大要
1	周添旺	黃昏嶺	阮是十八薄命農家女 離開家鄉出外來求利 想著歹命有時目屎滴 也是一不—得—已 離開阿母的一身—邊 阿母啊妳現時 像阮心內悲……
2	周添旺	梅前小曲	小雨毛毛落味煞 冷風吹來也會寒 單身謀生來出外 親像雨中的梅花 梅花開透白泡泡 怨嘆身世目屎流 環境親像烏雲罩 心情哀愁亂操操 春來梅花滿滿是 獨阮為何無春天 也無真情好知己 愁眉不展無了時

Changes in Women's Status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Working Women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eng, Sheng-fe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Taiwanese Cul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Being colonized and oppressed has been the mainstream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es about literature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yet there are different aspects of literature waiting to be explored. In addition to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 and oppression, there is a lot more space to be developed in studies of working women portrayed in literature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his period, Taiwan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which gave rise to many new occupations. In their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these newly emerged occupations expressed the trendiness and sense of new culture. As both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e civil society advocated the prohibition of foot-bin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girls' education, the encouragement of women's employment, there were corresponding subject matters in literary texts. Women's jobs include: nurses, teachers, phone operators, tea-pickers, actresses, tobacco workers, bus attendants, textile sock workers, textile workers, midwives, geishas, general laborers.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changes of women's statu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working women by various writers,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newspapers, differences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and differences among traditional literature, modern literature, poetry, essays and fiction.

**Key words: working women, women's literature, feminist literature,
modern/traditional literature,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